

【社会思潮】

逆全球化思潮的演进、成因及其应对

马超 王岩

【摘要】逆全球化思潮是逆全球化现象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较为高级的思想趋势或倾向。本轮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于2016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加速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特定的现实主体、存在场域、生存土壤、生成动力和价值诉求。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有着深刻的利益动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零和博弈”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宰制共同支配下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产物。逆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对华的全面围堵和整体遏制倾向,因此,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批判、谴责和防范逆全球化思潮层面,更要通过倡导共同体思维、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举措,在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实现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逆全球化思潮;资本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

【作者简介】马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1100)。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21.6.99~105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9JZD008)阶段成果。

逆全球化思潮是一种寄望于通过逆转全球化进程以实现自身多元利益诉求的新型意识形态。然而,由于全球化总体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在阻碍全球化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种种激进和非理性行为等原因,逆全球化思潮终究是一种违逆历史发展大势、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以致违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潮涌动和观念演绎。有鉴于此,我们既要理性接纳逆全球化思潮关于全球化批判的合理成分,更要深刻透视逆全球化思潮所寄托的虚妄不实的价值关切和利益观照,进而在对其予以彻底的批判性反思基础上,寻求消解逆全球化思潮的易于操作、便于落实、利于践行的普遍有效性对策。

一、逆全球化思潮的历史嬗变

逆全球化思潮是逆全球化现象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滋生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势或倾向。作为与全

球化相生相克的一个反命题,逆全球化是与全球化此消彼扬、相互掣肘的一种历史进程,尤其在某一具体领域里,逆全球化的勃兴,往往意味着全球化的式微。反之亦然。与此同时,相较于人类积极而为、主动推进的全球化,逆全球化通常表现为全球化对人类社会造成消极影响之后,人类“被动还击”的一个过程。因此,理清和对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演变,是我们探明逆全球化思潮“前世今生”的可行性分析路径。

(一)第一阶段:从古典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势头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

19世纪70年代欧洲开启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电力技术的使用以及金本位制的实行,不仅为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更推动了以欧美工业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形成。在这段时期,古典自

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成为西方各国对外贸易的主导经济思想。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否定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保护,主张各商品国应该消除关税壁垒以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最大化流通。相关数据显示,在古典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下,19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出口贸易额占全球GDP比重曾一度接近现代水平,而每年上百万劳动人口的全球流动占比甚至超越了20世纪末的劳动力全球化程度。^[1]然而,进入20世纪,无限制的自由放任政策造成西方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利益受损阶层开始通过投票、选举等形式公开阻滞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伴随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自由放任政策不但使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抢夺世界市场方面越来越占据优势,而且在瓜分殖民地方面也给老牌帝国带来愈发沉重的成本负担。于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重要标识,世界各国纷纷加强边境管控、拒绝自由移民,提高关税标准、阻止自由贸易,贸易战、货币战更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随着逆全球化势头的不断高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也迅速崛起,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二)第二阶段: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撑下的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涌动(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以“关税贸易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成为维系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运行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秉持被约翰·拉格称为“内嵌的自由主义”原则,既主张各国开放资本市场、开展自由贸易,同时也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部分干预。尤其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内嵌的自由主义”要求政府能够实现国内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避免再现两极分化。事实表明,这种将全球资本运作“内嵌入”对社会共同体保护之中的有限度的自由贸易政策,不仅极大推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更为“人类有史以来时间最长和最公正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2]然而,伴随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无法克服自身的“特里芬难题”而逐渐走向崩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纷纷出现严重的“滞胀”危机;经济陷入低速增长、财政赤字濒临失控、社会失业率居高难下……面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萧条,英国举行了第一次脱欧公投、部分发达国家重返贸易保护主义路线、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爆发针对此前因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培植的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霸权行为的抗议活动。随着参与群体的增多和涉及领域的拓展,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力日趋增强,并逐渐成为一股能够与全球化相抗衡的力量。

(三)第三阶段: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思潮的涌现(20世纪7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出现“滞胀”危机而凯恩斯主义应对乏力之际,美英两国率先向全球推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要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者将“滞胀”危机归因于国家干预造成的市场效率低迷和福利社会带来的普遍物价上涨。为此,西方各国开始通过采取减税和赤字财政等方式应对经济停滞问题,利用紧缩货币供给等方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短短几年时间,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使欧美国家迅速走出经济滞胀的梦魇,更进一步刺激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崛起,推动全球一体化进入新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然而,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新自由主义也引发了更为严峻的社会贫化现象,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部分欧美国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中产阶级再无产阶级化”现象。数据显示,仅2009年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中值较2年前的损失就超过1/5,2011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较10年前(去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更是减少近4000美元。^[3]更糟糕的是,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和自身经济的增长乏力,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红利持续趋紧,由此造成“逆全球化”政策在部分发达国家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迅速“凝聚”为社会各阶层的集体共识。至此,传统的逆全球化议题与新发的逆全球化潮流在同一时空境遇下相互交织、同步激荡,推动逆全球化思潮在新一

轮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得到巩固与深化。

二、逆全球化思潮的最新样态

逆全球化思潮是资本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衍生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4]540-541}的演进过程中,资本全球化是在总体上趋向于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普遍建立基础上,呈现为“阶梯递进”“螺旋交替”和“曲折演进”的历史发展状态。因此,伴随全球化的动态发展,逆全球化思潮也会随之演变出特征迥异、形态不一的存在样态。本轮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于2016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加速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仍处于强势勃兴但“尚未完全定型”^[5]的社会思潮,具有特定的现实主体、存在场域、生存土壤、生成动力和价值诉求。

(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高度共契,构成了本轮逆全球化思潮的现实主体

从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到欧盟右翼政党崛起,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到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借抹黑中国人权之机围堵中国发展,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欧美国率先停航停运、到一年之后欧美国家大搞“本国优先”的“疫苗垄断”……一系列事实都将本轮逆全球化思潮的始作俑者指向了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但较之以往不同的是,本轮逆全球化思潮不只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底层民众的利益吁求,更是西方社会各阶层利益共识的一次集体呈现,这其中不仅包括了由于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利益绝对受损的草根阶层,也包括了因为国家整体实力趋弱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的精英阶层,还包括了既出于代表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又鉴于自身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实力下降而不得不暂缓领导全球化进程的统治阶层。

(二)本轮逆全球化思潮的存在场域是多维度多样化多层次的存在

就存在场域的总体布局而言,本轮逆全球化思潮不仅凸显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还进一步延伸至包括科技、文化、社会、思想等在内的其他领域,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以经济和政治为轴心,以科技、文化、社会、思想等为辐射点,相互连通、彼此渗透的

“多维网状型”布局结构。就存在场域的表现形态而言,本轮逆全球化思潮可总体归纳为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政治领域的“单边主义”、科技领域的“霸权主义”、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社会领域的“民粹主义”以及思想领域的“反智主义”等。就存在场域的基本特点而言,本轮逆全球化思潮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较之以往都呈现出明显的升级态势,表现出立论根基的霸权化、价值理念的私利化、实现手段的极端化、群体基础的广泛化、话语权力的显性化等诸多新特点。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本轮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生存土壤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国际政局波诡云谲以及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等,都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发力、还是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快速转换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抑或是国际政治格局深度重塑过程中第三世界地位的快速攀升、甚至是在全球深陷新冠疫情困境漩涡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率先经济企稳回升……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正在将全球化红利朝向更有利于非欧美国家的方向转移,更为关键的是,它同时也开创了世界500年近代史上,世界权力重心第一次向非西方国家倾斜的先例。面对全球化福利的日益衰减和世界主导权的逐渐丧失,部分发达国家内部迅速爆发出抵制全球化的非理智情绪,这也在深层次上为逆全球化思潮的滋生提供了生存土壤。

(四)国际公共产品供求矛盾的日趋紧张,是推动本轮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动力

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世界各国日益成为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利益共同体。面对与日俱增的全球性挑战与国际公共事务,世界各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作为近现代以来推动全球化的积极领导者和主要受益方,发达国家长期承担着提供大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与“义务”。然而,自新一轮全球金融海

啸席卷以来,面对自身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的日趋被动,以及因此造成的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收益产出比”不断降低这一客观事实,部分发达国家在继续履行“世界政府”责任、维护全球治理秩序等方面均表现出能力与意愿下降态势。其结果是,全球治理在国际公共产品得不到及时供应状态下逐渐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与蔓延。

(五)本轮逆全球化思潮的价值诉求是致力于重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

近代以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进行自我增殖和自我扩张的一种逻辑呈现。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退群”所表现出来的逆全球化“显潮”,还是拜登政府通过暗中操纵国际舆论追究“中国责任”所蛰伏起来的逆全球化“暗潮”,其真实意图,都并非是要阻逆能够促进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而是寄望于通过重构现阶段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重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治理秩序,从而在掌握全球治理的绝对领导权和全球竞争的绝对优势力基础上,使自身能够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重新占据不被撼动的霸权地位。

三、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根源

逆全球化思潮反映和代表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者的集体意志与整体意愿。也就是说,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植根于全球化,是全球化症结累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爆发和必然呈现。从生成根源上看,逆全球化思潮既是对“零和博弈”支配下的全球化“积极抵抗”,亦是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负隅反抗”,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宰制下的全球化“正面抵抗”。

(一)“零和博弈”支配下的全球化是逆全球化思潮生成的思想根源

“零和博弈”是建立在“以邻为壑”“输赢对立”和“损人利己”思想范式基础之上的一种思维模式。自近代开启世界市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始终怀揣着敌我两分的政治偏见,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延续着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在由此塑成的西方社

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竞争与对抗”是全球化的永恒主题和历史铁律,具有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优先性。相对而言,“合作与共赢”则被西方社会仅仅视作是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有限性、暂时性、甚至是妥协性的方式与手段。以致,当前欧美发达国家深陷于历史经验的思想窠臼而无力自拔,陶醉于自由市场的疯狂逐利而不愿清醒,这也为它们无视全球化发展大势,漠视人类社会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现实,至今仍固守“零和博弈”的对抗立场,提供了貌似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的“事实依据”和“思想凭证”。

某种意义上讲,“零和博弈”支配下的西方社会对全球化进程的价值期待,与全球化现实发展及其未来走势的逐渐偏离,是催生逆全球化思潮的思想诱因。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将任何可能追赶甚至超越自身的国家、以及选择与自身发展不同道路的国家,都视为威胁加以防范、遏制乃至扼杀,其背后的思维逻辑支撑在于,欧美发达国家是凭借将“自我”与“他者”严格敌对起来的方式才取得一次次的“征服性胜利”,但恰恰是这些“征服性胜利”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着它们对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存在、以及世界历史的多样性演变的排斥与抗拒。然而,曾经主导国际秩序的欧美发达国家,原本寄望于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全球优势和世界霸权,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背道而驰的现实境遇。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落差,以及自身对于扭转全球化大势的无能为力,使欧美发达国家只能通过向全球化宣泄愤懑与恼怒,来转移和疏解由此产生的焦虑感与挫败感,这是逆全球化思潮生成的思想根源。

(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是逆全球化思潮生成的历史根源

作为“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6]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与“政府无用”,其根本目的是企图最大程度地释放资本增殖活力,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的无休止增长。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7][87]}作为资本唯一的“生活本能”,生产增殖就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为了

能够满足资本的扩张逻辑和贪婪本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鼓励私人资本通过不断积累来进行扩大再生产,以此促进个人资本向垄断资本的有效转变,实现资本增殖在“数量”上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深入发展,也在推动实体资本逐渐朝向虚拟化和金融化形态演变,其结果是不断缩短资本的循环周期,实现资本增殖在“效率”上不断提速。

欧美发达国家因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一再纵容而遭遇资本全球化的“反噬”,显现出逆全球化思潮生成的历史传承性与历史必然性。新自由主义使私人资本通过垄断性手段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由此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为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埋下了根本隐患。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将其核心理念积极拓展至全世界,在全球范围为资本寻找价值洼地,致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集聚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则逐渐“脱实向虚”,其结果不仅造成发达国家底层民众因实体产业外流而面临大量失业问题,同时虚拟资本的过度累积也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的金融泡沫风险,进而引发多重社会问题。然则,面对国内矛盾和全球化发展之间产生的“同频共振”与“同步深化”这一看似“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层却“移花接木”般地归咎为,是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的强烈冲击,以及自身承担过多“不公正”国际责任导致的结果。于是,质疑和敌对全球化的声浪在西方社会日渐高涨,并被迅速转换为发达国家的整体对外战略,最终导致逆全球化思潮的生成与泛滥。

(三)资本主义制度宰制下的全球化是逆全球化思潮生成的制度根源

究其根本,逆全球化思潮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在世界市场纵深发展中长期累积,进而集中爆发的一种思潮涌现。其重要依据在于,逆全球化现象的每一次出现,都紧随在首爆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而又迅速扩散至全球层面的经济危机之后,并且愈演愈烈。事实上,逆全球化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周期性回摆,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现实回应,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

盾运动后果的一种“调试”和“修正”。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18][582]}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展得到暂时性疏解,但世界市场的相对有限性与生产供给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彻底疗愈的“痼疾顽疾”。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的深化与演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9][299]},并且由此造成更深层次、更加激烈的政治经济危机,致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只能借助更为激进的“逆全球化”方式予以调和与缓解。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巨型跨国公司崛起和新自由主义扩张等因素的叠加耦合,推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转型的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向“‘债务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10]。然而,西方社会原本企图通过扩大债务消费的方式来达到缓解“生产扩大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目的,最终却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资产泡沫化膨胀,造成国家经济长期陷入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也是诱发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生成的最为根本原因。

四、逆全球化思潮的中国应对

廓清和洞察逆全球化思潮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动向,是我们牢牢掌握批判和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主动权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就其本质属性而言,逆全球化思潮尽管客观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现阶段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相对趋弱态势,但其背后却深刻显示出,全球化自始至终带着西方社会所主导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历史印记。就其发展动向来说,无论逆全球化思潮演变成何种样态,其真实意图都是冀望在延续霸权逻辑和增强对抗模式基础上,推进和形塑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动机和利益诉求的新型全球化形态。因此,我们绝不能只停留在批判、谴责和防范逆全球化思潮层面,更要主动谋求应对逆全球化思潮的科学策略,在理论维

度和实践维度实现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双重超越。

(一)倡导共同体思维,凝聚共同发展的新全球化价值共识,是我们应对逆全球化思潮的理念目标

当前全球化进程尽管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关系为基础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世界多极化的快速演变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拓展,已然推动全球化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使人类社会来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11][15]}。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的强势兴起也表明,“零和博弈”不仅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戕害,同时也在侵蚀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面对新的历史境遇,“零和博弈”所缔造的全球化结局,将不再是“西方强权”制裁下的“损人利己”,而只可能是“负和博弈”冲突下的“两败俱伤”。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呼唤全新的理念原则和价值引领,以推动全球化朝向更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蓬勃迈进,才是历史所向、现实所需和大势所趋。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支撑的“共同体思维”,是一种基于全球共赢以谋求各国共同发展的整体思维模式,它不仅实现了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内核解构与范式转换,更实现了对资本逻辑支配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的批判性否定和创造性超越,必然能够成为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基本理念范式和根本价值遵循。作为体现世界历史行进规律的共同体思维,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建的美好价值愿景,放眼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尊重国际社会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存在形态,致力打造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新全球化价值共识,展现出“认知上的科学性、利益分配上的合理性以及道德上的正义性”^[12],必将获得国际舆论的普遍认同和国际主体的广泛体认。但需要强调的是,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勃兴,尽管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在国际社会推行“理念转换”和“价值更新”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想要彻底消弭西方社会既往固化的私利视域和短视行为,却绝非一蹴而就之事、一朝一夕之功,这就需要中国能够在立足自身长远发展,持续提升国际话语实力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睿智和更为

理性的深谋远略与战略智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优质互动,是我们应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战略部署

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多是基于文明层面存在的认知分歧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碰撞与对抗,逆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的最大威胁在于,西方社会各阶层对全球化的非理智抵触情绪,极易在民粹主义统治者的煽动与操纵之下,转移并上升为国家层面对华发动的全面围堵和整体遏制战略。尤其近年来面对自身经济复苏乏力,与“中国之治”下的“经济这边独好”所构成的强烈反差,部分西方国家企图边缘化我国全球经贸地位的决心更加坚定,不仅利用自身的“规则优势”提出所谓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政策,更凭借自身的“发展优势”对我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科技脱钩和金融施压等多项围堵举措,迫使长期倚赖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在面临巨大的可持续性发展压力之际,不得不思考变局之下新的发展突围之机。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3]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我们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思潮现实冲击的实然之举,也是我们主动融入全球化发展大势、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当前我国发展亟需统筹好“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与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侵蚀”工作,因为这一课题不仅直接规制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调整,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我国的整体战略发展。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14][10]}但这种“开放的大门”应该是能够使我国既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真正体现高水平、高层次、高规格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此,我们需要继续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要抓手,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为根基,以国际循环为动力、为补充,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循环体系和发展格局”^[15]基础上,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并最终凭借我国自身发展的高质量与高品

质,为抵御和消解逆全球化思潮提供充足底气和强劲实力。

(三)立足“一带一路”建设,塑造更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型全球化,是我们应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实践路径

在全球治理层面,逆全球化思潮的涌现,既凸显出资本逻辑主导全球治理所存在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同时也表现出西方社会为克服这一结构性矛盾,企图通过“勾结”利益盟友、“操纵”国际组织、“摆布”国际规则等方式,加快全球化“转型升级”,以塑造更利于自身私利的新型全球化的意愿与决心。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和“战略经济之争”,也是一场关乎争夺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治理变革之争”。为此,我们唯有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型全球化,才能有效消除逆全球化思潮“周期性回摆”带来的长期隐患。需要强调的是,“塑造更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型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并非是对唯我独尊强权逻辑的复制与延续,它本身预设了对“弱者”的普遍尊重与合理关切,从而彰显出“崇包容、讲普惠、守诚信、重合作、求共赢”^[16]的实践交往原则,这恰恰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价值理念上的共契性和实践逻辑上的同构性。

作为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最现实需求为基准目标的“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构建从区域到全球的多边治理规则和制度结构,在抵制和反对由西方社会发动和挑起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中的作用逐步增强,积极推动了以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形成与发展,是当代中国为塑造新型全球化提供的中国力量和现实方案。但面对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企图凭借自身超群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压服和诱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其设置的“单边主义”规则,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的建设中,进一步坚定和强化多边主义立场,力求在“以优化区域一体化布局为核心支撑,以完善全球一体化布局为战略诉求”^[17]条件

下,形成更加平等的国际制度准则,实现更具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全面开启能够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模式和世界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 [1]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与反思[J].中国经济问题,2020,(2).
- [2]宋伟.试论约翰·拉格“内嵌的自由主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
- [3]陈伟光,蔡伟宏.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双向运动”理论的视角[J].国际观察,2017,(3).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徐艳玲,张琪如.新一轮“逆全球化”本质的多维反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2).
- [6]高和荣.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J].政治学研究,2011,(3).
-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吴茜.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制度转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
- [1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2]贾中海,程睿.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特质、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J].理论探讨,2021,(2).
- [13]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N].人民日报,2020-07-22.
-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5]蒲清平,杨聪林.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
- [16]王岩,陈绍辉.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J].中国社会科学,2019,(3).
- [17]王岩.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辩证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21,(4).